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研究

尹雪华 著



www.xuelinpress.com
学林出版社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研究

尹雪华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研究 / 尹雪华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486 - 1150 - 9

I. ①先… II. ①尹…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汉时代 IV. ①K23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3652 号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研究



作 者—— 尹雪华

责任编辑—— 岳拯士

封面设计—— 仲昭宇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021 - 64515005
网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o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5 万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6 - 1150 - 9/I · 163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用叙事学的理论来研究解析叙事作品,是学术界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热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类的成果已经不少,如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美]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等。此两部著作所论述的文本,莫不是先秦两汉时期如《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国策》《史记》一类的史传作品。因此,深入分析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的叙事特征,是非常切合的一个选题。

本书的题目是“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研究”,其所研究的对象主要以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作品为主。诚如尹雪华所说,西方叙事学首先在对虚构叙事即小说(文学)的分析中取得成绩,之后逐渐转入史学领域;而中国叙事理论恰恰相反,首先是在史学领域内受到重视,而后在小说领域内取得大的发展,但始终没有脱离史学叙事的影响。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叙事作品,是从史传开始的。即使是作为史传作品源头的甲骨卜辞的记载,也是叙事。中国最早的史传作品,是历史著作,但却是以讲述事件甚至是讲述故事的形式来记载历史的。所以,叙事是记载历史的一种方式。先秦两汉史传作品其本质是史书,那些具有文学特性的史书,我们称之为史传文学,是很恰当的。这样的历史与文学交融的性质,又为运用叙事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提供了可行性。

鉴于史传文学作品既是史书又是文学作品的性质,尹雪华首

先注意到先秦两汉史传叙事与历史重构的关系,也就是本真地再现历史与描述历史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正如朱自清所说的“《左传》既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史学与文学的完美融合,《左传》是典型代表。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其“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尹雪华认为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就是一种纪实叙事”,“史传叙事中既包含有历史叙事因素也包含有小说叙事因素”。这样的看法是可以认同的。

作者要探讨的是史传的叙事,那就必然涉及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叙事的关系。作者在本书中指出,历史是客观的,史传则是以客观历史为基础的叙述人的主观行为,叙述的过程充满了主观的价值判断,充满了叙述人的猜测。叙述本身是作者运用“建构的想象力”对逝去历史的重新建构,而不是客观地再现。作者概括,分析的历史与史传叙事的区别有几个方面,如历史没有叙述人,而史传作品总是由叙述人叙述;史传叙事总是有“遗漏”;历史是无序的,史传叙事是有序的;历史是不可间断的;史传叙事是可间断的;历史的立体型和历史叙事的平面性的矛盾,等等,揭示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与历史叙事的区别与关系。这些应该是历史客观与历史叙事之间存在的必然规律。其实,人们如果一定要再现原生态的历史原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总是会有“遗漏”。就像数学上的极限概念,它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横坐标,而不能与横坐标有交点。也就是说,你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原貌,而不可能还原历史存在。那么,由此说来,完全“实录”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像《史记》那样的史书,被称为“实录”又是后人所公认的。尹雪华经过对经典史传作品的分析,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提出了“叙述人退场”、大量使用人物语言、增加大量细节以及时序上的调整等手段,来揭示“实录”的合理性。这是她考察了大

量史传作品得出的结果,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的,因此也是有说服力的。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特征,是尹雪华论文的重点。叙事人的特征,是研究史传叙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尹雪华详细讨论了叙事人的不同形态、叙事人对于叙事干预的各种形式。尤其是她注意到从先秦到两汉叙事人的变化,即她在论文中所说的:“相对来讲《左传》中叙述人的声音比较微弱,叙述人让人物与事件自行浮现,无论在主观情感还是理智判断上,叙述人都比较收敛,不让自己过多介入。到了《史记》叙事中,叙述人的声音通过其浓郁情感的抒发以及包含在情感中的判断表现出来,然而叙事仍然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让历史人物自己表现自己。叙述人通过精心提炼叙事主题,精选题材再辅以巧妙的时间安排等叙事手段清晰地传达出自己的声音。”其次是叙事视角。无论是全知聚焦与限知聚焦,尹雪华在先秦两汉的史传作品中找到众多鲜活的例子。先秦两汉史传中常见的倒叙、预叙、侧叙、回叙、夹叙、追叙、总叙等众多手法的娴熟运用,说明史传作者在历史叙事方面对于时间掌握的科学性。叙事结构方面,尹雪华细致分析了编年体与纪传体这两种主要的叙事结构,对它们的优缺点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如编年体结构是《左传》叙事走向成熟的桥梁,它为《左传》开创宏大历史叙事提供了可能性,但也存在详于叙事而疏于写人、受时间限制等缺陷。纪传体结构超越了单纯支撑叙事内容的构架作用,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包容万象的叙事方式,对历史人物的位置安排体现了叙述人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以及对历史人物的定位与评价。纪传体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质。纪传体叙事虽然也有自身的不足,但却可弥补编年体的缺陷。由此可知,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成为史学叙事的主流样式,与其叙事方式有密切关系。此

外,尹雪华还探讨了先秦两汉史传叙事文学性的生成机制,认为从叙事方面究其原因,与其记言方式和叙事时距的变换有密切关系。

本书是尹雪华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从博士论文答辩至今,已过了几年,与原论文比较,作者增补了大量的内容,在理论上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叙事学的理论,运用得更加娴熟,因此使得这本书稿显得更有理论的分量。虽然有的部分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如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文学性成因,可以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细微差别中论述得更深入一些。但我已经感觉到尹雪华的每一次修订,都是一次很大的进步。

雪华在大学任教,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有家庭和为人妻为人母的负担。但她并没有放弃科研,不时有新成果出现。这是颇为不易的。借此机会,我祝福她工作生活顺畅,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郭 丹

2016年4月12日于福州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对历史的重构	11
第一节 实用性写作目的的形成与叙事形式的选择	11
第二节 实录原则的确立与叙事真实性的保证	42
第二章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之“事”	77
第一节 历史与史传叙事的区别与联系	77
第二节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对历史的追摹与还原	84
第三节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两个基本要素：言与事	98
第三章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特征	122
第一节 叙述人	122
第二节 叙事视角	155
第三节 叙事时间	169
第四节 叙事结构	212
第四章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文学性成因	238
第一节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文学性的生成机制	238
第二节 先秦两汉史传叙事向小说叙事的演变趋势	250
结 语	261
参考文献	264
后 记	271

绪 论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① 史学的发达，源于史官建置的完备。史官建置由来已久，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一文中说：“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这种说法虽然没有足够的文献可资凭证，却反映出我国史学意识的源远流长，可以说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史官^②。有了史官，历史便有了专人记载，所产生的历史文本之多，亦属当然之事。单就先秦时期而言，常被后人提起的就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其中《世本》不知何人所著，为《史记》之蓝本，宋时已佚。据诸书征引的情况看，内容有《帝系》《世家》《传》《谱》（即《周谱》）《氏姓篇》《居篇》《作篇》等。除此而外，先秦时期见于文献记载的历史文本还有：一、《春秋》类史书。当时各国皆有《春秋》，孟子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墨子称“百国《春秋》”是也。二、《尚书》类史书，如春秋战国时人们常征引《夏志》《商志》《周志》或《周书》《周记》等。三、《左传》中提到的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四、《庄子》中提到的有《金版》《六弢》。五、出于汲冢的有《逸周书》《竹书纪年》《杂书》《穆天子传》《琐语》等。这些书大多成于战国时期，其中《逸周书》经明杨慎考证实非出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② 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夏朝开始已有史官，这大概是确定无疑的。”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页：“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

于汲冢,《竹书纪年》今已散佚,《杂书》中有《周食田法》《美人盛姬死事》,《杂书·美人盛姬死事》与《穆天子传》于今尚存,《琐语》今亦有辑佚本。六、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进入秦汉时期先后有陆贾的《楚汉春秋》、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其中《楚汉春秋》今已不存。《史记》在汉宣帝时面世后,续作者众多:见于《史记》一书的有褚少孙;见于《七略》的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①《史记》之后,刘向的诸多著作如《列女传》《说苑》《新序》等亦包含着极有价值的史料。除此之外,产生于东汉时期,界于历史与小说之间的有《越绝书》《吴越春秋》等。

本书研究对象是自先秦至两汉的所有史传著作。“史传”二字取义于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②他把“史”与“传”联系起来,称为“史传”。在《史传》篇中,刘勰论述到了包括《尚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在内的大量历史叙事作品,它们不仅是历史著作,亦包含着丰富的文学性。随着史传作品的诞生,也就有了对史传作品的研究。先秦两汉史传作品因其在中国经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引起的研究热潮两千余年来始终不曾减弱,研究成果不啻汗牛充栋。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先秦两汉史传作品之所以如此受人喜爱和重视,最基本的一点,是源于其高超的讲述故事的叙事能力,然而对史传作品的叙事研究,却一直是一个薄弱点,当然这和中国叙事理论本身不发达有直接关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从叙事的角度深入研究史传作品,就必须有一个系统成熟的关于叙事的理论,近年来发展起来的西方叙事学,正好提供了这一方面的理论参照。

西方叙事学自20世纪60年代正式确立名称以来,经历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阶段,经典叙事学的全盛期维持时间并不久,很快受到7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的全面冲击,至90年代走入低谷,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② 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8—129页。

进入所谓的后经典叙事时期。这样的发展过程表明西方叙事学并非完美无缺,它只是众多文学批评流派中的一种,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21世纪叙事学又重新回到文学批评领域,且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叙事学开始被用于分析非文学文本,尤其在历史叙事领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证实了叙事学是分析叙事文体的有效工具。

西方叙事学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分支,植根于深厚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西方现代语言学将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日常使用的言语只有放在语言这个系统中才有意义,语言学的任务就是对该系统进行共时性研究,探讨其深层结构,着重分析语言系统内部是怎样由某一深层结构转化生成众多的表层结构。叙事学以此作为理论依据,同样致力于揭示在众多的叙事文本中隐藏着的叙事深层结构,即叙事的普遍结构。而后,随着叙事学的发展和理论日趋成熟,注意力逐渐集中到对虚构叙事文本的研究上,研究小说叙事文本的叙事结构,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研究小说叙事文本中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叙事学的前提是把叙事作品视为封闭自足的体系,如果说批评所关注的是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话,叙事学显然只关注作品本身,它切断了作品与外界的所有关系,拒绝从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学等文学外部因素上考察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叙事学受到猛烈的批判。因为叙事学只关注叙事文本本身,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原生态的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与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即故事是如何被组织成为叙事文本的。作者、读者作为现实中的存在,并不能直接进入文本,因而叙事学所要研究的是隐含作者、叙述人、叙事文本、隐含读者的关系,其中以叙事文本为核心,研究故事与叙事文本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分析叙述人如何叙述故事,故事如何变成了叙事话语。尽管叙事学内部术语五花八门,意见也远未达成一致,然而故事与文本(叙事话语)、叙述人、叙述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概念的区分却成为大家共同讨论的基础。叙事学在百家争鸣之中形成了一套操作性极强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毋庸置疑,西方叙事学

并不是放之四海皆通的理论,也并非所有相关理论都适用于中国叙事作品的分析,比如叙事学基于西方语言的叙事语法、时态、语态、语式等的探讨,由于中西语言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不太可能直接借用。但也不可否认,叙事学有它独特的贡献,照亮了其他批评方法所无法看到的地方,它极强的操作性,也保证了它成为分析任何叙事文本的有力工具。

与西方叙事学相比,中国叙事理论表现形态上比较零散而不成体系,且大多限于印象式的批评,易流于表面化;所用的术语往往多比喻和借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缺乏明晰和确定性,再加上没有像西方叙事学那样有着深厚的语言学作基础,限制了理论进一步系统地发展。与西方叙事学相比,中国古代叙事理论远没有走向成熟,就连对叙事理论做出巨大贡献的金圣叹,其理论在当时也被人讥为谈论文章作法而不被重视^①。

西方叙事学首先在对虚构叙事即小说的分析中取得成绩,之后逐渐转入史学领域;而中国叙事理论恰恰相反,首先是在史学领域内受到重视,而后在小说领域内取得大的发展,但始终没有脱离史学叙事的影响。因此中西方关于叙事的理论在许多方面是不一致的,比如历史叙事真实性的问题就从未困扰过中国学者,对中国学者来讲,真实与虚构有一简单而明确的区分,即史书据实而书,就是真实,相反那些向壁虚构的东西就是虚构。但西方叙事学中,却对这一问题予以深入的讨论,证明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本质是相同的,即历史叙事本质上存在着虚构性,从而区别了真实性与客观性的不同,提出了主体间性等新的理论观点。将叙事学引入史学领域,论证历史叙事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对过去的客观实在的再现,而毋宁说历史叙事重新建构了过去的客观实在。认为历史叙述不可避免地兼容历史解释,或者进一步说历史叙述本身就是历史解释,这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大成果。“认为真实性

^① 蔡元放:“金圣叹批《水浒传》《西厢记》,便说于子弟有益,渠说有益处,不过是作文方法耳。”引自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与客观性并不是所谓的历史实体的本来品质,而是主体在认识中获得的评价标准。”^①

中国叙事理论发展中,最早要算刘知幾的《史通》,在该书中,除《叙事》篇外,其他许多篇章或多或少地对叙事都有所论及,《史通》提出历史叙事的典范是《左传》,并对历史叙事方法予以了初步的总结。之后,零零星星的有过一些总结叙事类别方面的论述,如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元代陈绎《文筌》将叙事分为 11 种。进入明清以后,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和对八股文作法的探讨,对小说叙事的研究逐渐变得热门起来,有以小说序跋的形式,有以评点的形式,有以专论的形式等集中对四大奇书进行叙事分析,这其中尤以金圣叹的理论最为深入也最为系统。对史传作品的研究也开始注重叙事方法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左传》和《史记》等作品上。诚然,从叙事角度看,他们的探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作文方法”的层面上,远不能和西方的叙事学相提并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经过这些人的努力,中国叙事理论逐步走向深入,虽然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传统对于叙事的探讨也就此戛然而止,我们无法预言其顺利发展会不会最终成为一个完整体系,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但仅就现有的成就看,中西方对叙事的探讨,虽然所用术语不同,两者之间亦有相似之处,比如像西方叙事学中区分的叙述人、叙述时间、叙事视角,在中国的叙事理论也有所涉及。这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可以作为运用西方叙事学研究中国叙事作品的基础。

西方叙事学传入中国以来,很快得到响应,出现了许多介绍西方叙事学的理论专著。中国学者对于叙事学的接纳更多的并不是理论上的创新,而是积极地将之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用来分析中国叙事作品。将叙事理论化繁为简,用来分析研究中国叙事作品的专著越来越多。运用西方叙事理论研究中国叙事作品的著作中,由于考虑中西叙事观念上存在的分歧以及中国叙事传统的独特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相应的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或者更为重视中国叙事传统本

^① 参见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2页。

身,如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奇书文体”(《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照搬西方叙事学,而是从中国小说实际出发,结合中国文学理论成就,从结构外形、修辞、寓意、思想内涵等诸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有的借用西方叙事学而加以灵活变通,如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从“叙述人、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角色模式、叙事结构、叙事修辞”诸方面,揭示出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中小说叙事的叙事特征与叙事功能。在具体操作中,他将西方叙事学做了合乎中国小说实际的变通,如西方叙事学注重共时性的研究,但该书却更重视历时性的分析,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对“叙述人”的分析也是如此,叙述人在西方叙事学中本是一个极端复杂也多有争议的概念。王平在该书中将之简化并结合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实际,变通为史官式、传奇式、说话式和个性化四种叙述人类型。本书的其他各章节在运用西方叙事学时也都做了或多或少的变通。

西方叙事学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理论,最先也是在虚构性叙事的分析上取得成功,所以中国理论界将之拿来为我所用时,也基本上局限在小说叙事领域内,较少涉及历史叙事。近年来,这一现象正在逐步得到改变。这是因为:一是由于西方叙事学已经开始蔓延到历史叙事领域,并在理论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像海登·怀特、保罗·利科诸人的研究,为叙事学分析历史叙事作品奠定了基础。二是经过一段时间热闹的探讨研究后,中国对于西方叙事学逐渐掌握理解,发现与中国叙事作品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积极地着手构建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体系,尤其是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传作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不得不考虑到与历史发生关系。先秦两汉史传作品,不管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的角度讲,在中国叙事作品中都占据着首席地位,这样不管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还是探讨中国叙事理论,都会涉及先秦两汉史传作品。杨义《中国叙事学》一书,在尝试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理论体系时,较多地举史传为例。应用叙事学理论研究史传叙事的专著有傅修延《先秦

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①，该书第五章《事实与虚构：史传运事的兴盛》，对《左传》等的叙事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该书更多带有中国本土色彩，没有过多应用西方叙事学，如第四节“《左传》史有诗衣”，分别从：一、记言与记事的均衡合宜；二、文本与记事的基本对称；三、事实与虚构的交融互渗；四、冲突与呼唤：叙事主体的活跃与编年史体的桎梏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收录了11篇论文，是从叙事学角度研究史传作品专题论文集，该书运用西方叙事学分析阅读《左传》《国语》《史记》诸文本，其重心仍然是从虚构叙事出发，“从叙事文学角度重新审视早期叙事文”，该书也注意到了历史叙述与虚构故事之间的关系，从该书的研究成就就可以见出经典叙事学的确长于分析叙事虚构作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有一小节论到了史传对于小说的影响。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之一为“史官式叙述人”，对包括先秦两汉史传作品在内的历史叙事的叙述人进行概括的论述，虽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却能面面俱到。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主要是分析中国“奇书文体”的叙事特征，并更多在吸收了中国文学理论成果，该书开头部分“叙述人口吻”一节的论述中，涉及史传叙事，指出了“中国正史叙述人总是一副全知全能者的姿态”这一特征，认为“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等这一中国史书中“叙中夹评”的传统，“透露出多视角的叙述观念”，并重点分析了《史记》中“荆轲刺秦”的一段叙事，对史传作品叙述人的问题重点做了分析。在该书中，作者看到了中国小说和史书之间的血脉关系，指出了中国叙事传统与西方叙事传统的截然不同的一面，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上与史传叙事相连结。王成军《纪实与虚构——中西叙事文学研究》中提倡叙事学应关注纪实叙事，认为“从叙述学的角度看，史传叙事或说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是相通的”，由于该书重心并不在于具体论述纪实叙事，因而对此并未展开细述，但他提出

^①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

的这一思路却有益于史传叙事的研究。潘万木《左传叙述模式论》综合运用了西方叙事学以及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就《左传》的叙述特色进行了总结,尤其是针对《左传》中的征引、评论、预言叙述模式作了探本溯源的研究,该书并没有就叙述学理论对《左传》作全面的分析,而主要就《左传》所呈现出来的典型特点作叙述学的说明。将西方叙事学运用来分析中国历史叙事的著作有李纪祥《时间·历史·叙事》,该书共收录九篇论文,是对历史叙事研究的理论专著,借助于海登·怀特等人的历史叙事学理论,对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叙事中的真实与虚构、时间与叙事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是近年来从叙事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叙事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本书尝试从叙事的角度分析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由于中国叙事理论未能发展成熟,单纯运用中国叙事理论势必捉襟见肘,而西方的叙事学又首先也主要是在小说叙事的分析中成熟壮大起来,如果纯粹运用西方叙事理论,抛开西方叙事理论与中国叙事作品龃龉难合之处外,适用于虚构叙事分析的理论未必完全适合纪实叙事,因此本书尝试以西方叙事学为指导思想,有效地借鉴西方历史叙事研究的最新成果,同时不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在具体操作方面,吸收中国叙事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理论,借鉴已有的有关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的研究成果,尝试描述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的叙事形态,通过观照其演变过程中显示出来的叙事特征,思考何以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文学性会比后来的正史叙事强烈的原因所在。

本书的理论出发点是认为在先秦两汉史传作品研究中,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再简单地将虚构性作为区别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重要标志,而是将虚构做一分为二地分析。一直以来人们将虚构单纯地理解为内容上的虚构,的确虚构的故事容易被叙述得有声有色,但虚构并不能保证故事叙述出来一定具有文学性。一个虚构的故事也很可能被叙述得干瘪乏味,相反一个真实的故事却可以被叙述得津津有味。可见关键是在于故事如何被叙述,不在乎内容上是否虚构,如果承认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区别就在于其中故事虚构成分的多寡这一观点,那么我们要么承认《史记》

根本没有文学性,要么根本不承认其为历史叙事。考察先秦两汉史传作品在古代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人们认为其中浓厚的文学性所在,正深源于史传作品中渗透了史家的心血,正体现在文章的章法上。而在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上,人们恰恰着眼于史官可贵的实录精神,也就是说看重的是史书中纪实的成分,其中的虚构成分恰是人们批判的靶子。典型的如刘知幾《史通》,该书对史书叙事中出现的虚妄成分痛心疾首,却对虚构成分最多的《左传》叙事成就推崇备至,认为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境界,可见刘知幾并没有简单地将虚构作为《左传》叙事成败的关键。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虚构、真实只是就叙事中素材(或称故事,与情节相对)的不同性质而言,而叙事学关注的是素材如何被组织成叙事文本的过程,这一过程当然最终是通过文本体现出来,因此叙事学是对文本的形式研究,脱离了文本的素材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之所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就在于叙事操作的不同上。所以本书认为史传叙事就是一种纪实叙事,不再静态地定量分析某一种文本中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多少——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二者显然不能截然分开;本书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形式,承认史传叙事中既包含有历史叙事因素也包含有小说叙事因素,在动态的描述中,找出史传作品共同的叙事特征,同时通过对历史叙事演进过程的描述,指出不同发展阶段中史传作品由于叙事操作的不同,引起了叙事形态的改变。换句话说,本书认为从先秦到两汉的所有史传作品,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存在,这就是史传叙事具有作为纪实叙事的一般特征,没有了这一共同特征,我们也就不会将它们一同视之为史书。不过,这其中又存在着发展变化,《左传》的叙事形态与《史记》不同,《史记》又与《汉书》不同,这种不同正昭示了史传作品向后来的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分流演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从《左传》叙事发展到《史记》叙事是一个关键阶段,从《史记》往下,史传开始逐渐分流,沿纪实叙事的方向发展的,成为《汉书》及以后的历史叙事;沿虚构叙事方向发展的,则成为《吴越春秋》《越绝书》及以后的小说叙事。因此先秦两汉史传叙事的重点是《史记》,转捩点亦是《史记》一书,本书即以《史记》为聚焦中心,以此结构